本版编辑：李步前 版式设计：张 慧 E-mail:f4@studytimes.cn Tel:010-68922368

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

——毛泽东与岳麓书院的不解之缘

□ 唐珍名

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自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创建以来，千年办学不辍，素有“千年学府”之称。1903年，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在其旧址上几经发展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于1926年与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合并，定名湖南大学。深受千年书院文脉影响的毛泽东，与岳麓书院及后来的湖南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崇尚岳麓书院的教育教学方式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可谓耳濡目染。1910年，毛泽东就读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即源于东山书院。到长沙求学之后，作为古代书院教育标杆和湖南书院中心，岳麓书院备受毛泽东崇敬和青睐。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每逢周末，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张昆弟等同学活动的主要去处之一就是岳麓书院。张昆弟曾在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

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研讨自由、课程简要、强调自修等教育教学方式十分推崇。1912年，岳麓书院发展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6月25日，在看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的招生启事之后，毛泽东寄上通告并写信邀请友人一同报考，在《致湘生信》中畅言：“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吾意与足下宗旨相合，可来考乎？”虽然毛泽东最终没有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就读，但受毛泽东推荐信号召，邓中夏与蔡和森于当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的文史专修科乙班学习。

不仅如此，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还表示要组织类似古代书院的讲学机构：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4年后的1921年8月，毛泽东按照岳麓书院教育教学样式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并于1922年7月邀请李达担任校长。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毛泽东详细列举了古代书院师生感情甚笃、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等长处，并将湖南自修大学定位为“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成为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亲笔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充分表达了对由岳麓书院发展而来的湖南大学的关心厚爱。1951年元旦，湖南大学在岳麓书院举行了隆重的校匾升悬典礼。

在岳麓书院的早期革命活动

1916年至1919年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寓居岳麓书院，从事早期革命活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能够寓居岳麓书院，主要得益于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帮助。杨昌济既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也是由岳麓书院发展而来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是他的兼职。杨昌济于1916年起负责主持湖南大学筹建工作，湖南大学筹备处就设在岳麓书院半学斋。

毛泽东在岳麓书院寓居有两次时间相对比较集中，一次是1918年6月至8月，另一次是1919年8月至11月。1918年6月，毛泽东和同学们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有的同学还没有找到如意工作，大家寓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成立“工读同志会”，实施“岳麓新村计划”。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中描绘了当时的场景：他们一边读着书，一边作今后的计划，思考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这许多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的心情是最不宁静的，岳麓山古迹中流传的一副老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正好作为他当时的心情写照”。

1919年8月，由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被查封，毛泽东随被取缔后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从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迁往岳麓书院半学斋，接手主编杂志《新湖南》，并辗转于岳麓书院与他担任历史教员的长沙修业学校之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蒋竹如回忆，“毛泽东同志和学联其他负责人搬到湖大筹备处，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进行揭露和抨击”。

30多年过后，即1955年6月20日，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在重游湘江、再登岳麓山之后，直奔岳麓书院，写下了如今刊立在岳麓书院赫曦台上的七律：“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这首七律既是毛泽东当时重回岳麓书院时的心情写照，也饱含着他与岳麓书院的不解情缘。

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学风的熏陶

实事求是是岳麓书院传承千年的优良学风，毛泽东深受熏陶。在岳麓书院寓居期间，毛泽东与高悬在岳麓书院讲堂的“实事求是”校训，可谓朝夕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对“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有了更深的思考，为其实事求是思想的孕育形成提供了最为直观的熏陶。正如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岳麓书院考察时所指出，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

毛泽东人生的前30年主要在湖南度过，此间湖湘实事求是的世风民风对其熏陶影响可谓与生俱来。在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的授课教师杨昌济、黎锦熙、方维夏等不少为岳麓书院的毕业生。《达化斋日记》记载，杨昌济积极向毛泽东讲授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岳麓书院先贤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在《讲堂录》中，毛泽东摘抄了许多岳麓书院先贤的格言警句，时常温习，并写下很多相关体会，诸如“涤生日记……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等等。毛泽东同学萧三曾回忆：“长沙城里曾有人组织过‘船山学社’……泽东同志邀请我们少数人也去听讲，他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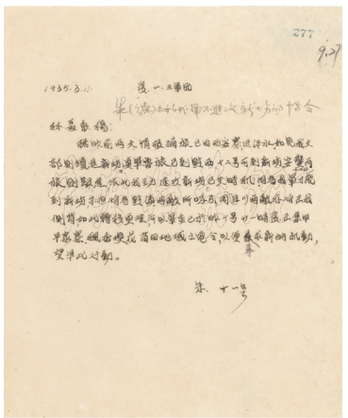
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长沙岁月里，毛泽东的同学朋辈蔡和森、邓中夏、谢觉哉、易礼容、彭璜、王尔琢等，不少曾就读岳麓书院，或是杨昌济的学生。毛泽东与他们不仅结下了深厚友谊，而且在游学、组织学会、参加社会运动之中，碰撞思想，影响甚深。毛泽东与萧子升、蔡和森等同学分别于1917年暑假、1918年春天游历湖南9个县。彭璜当时是湖南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大力支持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发动湖南学生运动和组织开展“驱张”等社会活动。谢觉哉则协助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创办平民夜校、工人夜校，易礼容曾协同毛泽东创办长沙文化书社。虽然毛泽东和同学们组织的“问题研究会”最终没有成立，但在其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不仅明确提出了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144个问题，而且对其中很多问题与同学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实践探索，包括前文所述在岳麓书院一带建设“岳麓新村”。

学史明理

一份“不进攻”电令见证党的重大决策修正

□ 娄亚丽

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遵义苟坝村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问题，多数同志主张打，毛泽东力主不打。会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了攻打计划。会后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沿着小路前往周恩来住处陈明利害，建议缓发作战命令。次日，中央负责人会议重新讨论，最终下达《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一份“不进攻”的电令，折射出长征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意见分歧、如何修正决策、如何在民主基础上实现正确集中的优良传统。



朱德《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中央档案馆 藏）

攻打打鼓新场争论的由来

1935年2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此时，敌人援军到来，企图向遵义进行反攻。28日下午，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以1个团攻击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向老鸦山，经过激战，攻占了该山制高点。但黔军因屡遭红军的打击，畏缩不前，导致吴奇伟部孤军冒进。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主力从水师坝突破黔军阵地，直插忠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这一出敌意外的打击，使黔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约1个团逃窜。黄昏，红军干部团投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回老鸦山制高点，歼敌大部。二占遵义的战役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鼓舞了全军士气，狠狠打击了敌人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焰。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图”，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3月2日，他飞往重庆“督剿”。3日，电令驻川、黔各军在乌江设防，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遵义、鸭溪地区。

为了应对蒋介石新的围攻，加强作战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至此，自1932年宁都会议被取消在红军中领导职务的毛泽东，被正式赋予了对中央红军直接的领导权。3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距离遵义和打鼓新场各百余里的苟坝。彼时，国民党军有1个师在遵义西的打鼓新场一带。

经过遵义大捷后，红军部队求战情绪高涨。3月10日1时，林彪、聂荣臻致电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电文提出，“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十一日到达”。一场围绕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就此展开。

打还是不打：会议上的激烈争论

天亮后，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王稼祥等人参加，讨论攻打打鼓新场计划。会议在要不要攻打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多数同志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但毛泽东是持反对意见的。他有三点考虑：一是红军主力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二是滇军也将赶到打鼓新场和黔军会合；三是川军还可侧击红军，因此力主不打，并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相抗争。但是此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有人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会议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表决，免去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并作出了攻打计划。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又一次受到忽视，红军的命运再次来到紧要关头。

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前往周恩来住处，建议缓发作战命令。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场景：“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周恩来也曾回忆当时的情形，毛泽东“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正式下达“不进攻”指令

3月11日凌晨，张闻天再次在苟坝组织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重新开会讨论，经过周恩来的劝说，与会者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放弃进攻打鼓新场。凌晨一时半，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关于为何不进攻打鼓新场，电文指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所以军委已于昨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望准此行动。”

同日，川军潘文华部3个旅占领遵义；周浑元纵队主力集结在鲁班场地区；吴奇伟纵队一部已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根据上述敌情变化，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13日，中革军委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各军团。当晚，红三军团于平桥、泮水地区击溃黔军第三旅，残敌向打鼓新场溃退。事实印证了毛泽东提议不打打鼓新场的正确性。

苟坝会议在充分讨论、个别酝酿的基础上，既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又充分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形成真正符合实际的集中意志，为党此后在复杂环境中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会议作出的《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对中央红军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的计划，取得战略转移中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其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提议成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这一建议得到采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为取得长征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国民党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3月21日至22日，部队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河。接着，中央红军经江口、大塘、梯子岩3处迅速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合击圈，踏上了新的长征路线。

档案中的党史

（上接1版）“七个坚持”重大原则合在一起，构成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原则性回答。习近平党建思想把自我革命作为管党治党的内在动力，使“七个坚持”不仅回答了“严什么、怎么严”，更回答了“靠什么保持严的持久动力”，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把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

深刻把握“七个坚持”的科学内涵

“七个坚持”是一个辩证统一、彼此支撑的有机整体，就其内在逻辑而言，服务使命任务、政治建设统领回答的是管党治党的根本方向问题；全面从严、问题导向、守正创新回答的是管党治党的实践方法问题；以上率下、依规治党回答的是怎样使原则在组织运行中获得主体保障和制度规范的问题。三个层面各有侧重、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有机体系。

以服务使命任务和政治建设为统领锚定管党治党的根本方向。方向问题是管党治党的首要问题。坚持服务使命任务，回答的是全面从严治党“为了什么”，管党治党根本指向是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管党治党的全部努力是促使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谋划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建设同党和国家事业紧密结合，确保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离开使命任务谈从严，从严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脱离中心工作搞党建，党建就会失去根基和引领。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回答的是管党治党“以什么引领”。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其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方面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政治建设统领的要义，在于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把准政治方向、落实政治要求，提高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确保全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服务使命任务确立目标指向，政治建设统领确立政治方向，二者共同构成“持之以恒”的方向确定性。

以全面从严、问题导向、守正创新确立管党治党的实践方法。方向确定之后，从什么基调推进、从哪里切入、如何保持适应性，就成为决定管党治党实效的关键。坚持全面从严，确立的是基调。严的基调不是一时一地的策略选择，而是管党治党的长期方针，核心在于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使严的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各方面，不因形势变化而松动，不因阶段性成效而递减。坚持问题导向，确立的是切入点。管党治党的持续性，靠的不是平均用力，而是对准突出问题、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中向前推进，不回避矛盾，不讳疾忌医，在纠偏治乱、激浊扬清中提高工作水平。坚持守正创新，确立的是适应性机制。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原则的坚持不能靠固守旧有手段，而要在守好根本的前提下紧跟时代、顺应实践。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摇，遵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运用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不断提出新举措新办法。全面从严提供力度，问题导向提供准度，守正创新提供适应度，三者共同构成“持之以恒”在方法层面的完整支撑。

以上率下、依规治党筑牢管党治党的主体保障和制度规范。任何原则的落实，最终都要落到人和制度两个支点上。坚持以上率下，解决的是示范引领与责任传导。管党治党的力度会不会层层递减，关键看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能不能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全会对规范“一把手”履职用权作出明确部署，正是要把以上率下从作风要求转化为可约束、可检验的责任机制。上级真管真严，下级才不会虚应故事；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原则的权威才能在组织内部真正树立。坚持依规治党，解决的是规则形态。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要注重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工作效能。以上率下使原则有人承载，依规治党使原则有规可依，二者共同构成“七个坚持”重大原则落地落实的主体条件和制度条件。

坚持好运用好“七个坚持”重大原则

深刻理解和把握“七个坚持”重大原则，目的全在于运用。“七个坚持”重大原则只有转化为管党治党的实际行动，才能真正发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威力。

坚持“七个坚持”重大原则一体贯彻，防止选择性执行、碎片化落实。“七个坚持”重大原则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一条都在其他原则的支撑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七个坚持”必须“一体贯彻落实”，其要义在于，原则的效力不取决于单条原则的强度，而取决于七大原则之间的贯通和互补。防止选择性执行，就是防止把原则体系拆成可以各取所需的“菜单”；防止碎片化落实，就是防止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出现“各管一段”的断裂。要坚持系统思维，处理好全面与重点、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的关系，使管党治党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各方面要求相互衔接、同向发力，真正发挥“七个坚持”重大原则的系统集成效应。

坚持衔接系统部署，把“七个坚持”重大原则要求转化为管党治党的实际成效。原则不是悬空的。全会《决定》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系统部署，提出增强党性、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从严治吏、组织体系、正风肃纪、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制度治党等各项任务，正是“七个坚持”重大原则获得实践形态的具体载体。服务使命任务，通过围绕中心任务加强政治监督来落实；政治建设统领，通过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来体现；全面从严，通过正风肃纪反腐的持续力度来检验；依规治党，通过党内法规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来保障。原则与部署不是外在的“对应关系”，而是内在的贯通关系：原则为部署提供方向和标准，部署为原则提供落脚点和检验尺度。把原则要求转化为实际成效，关键在于不让原则停留在文件表述层面，而是使之进入每一项部署的谋划、执行和评估之中，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实际成效。

坚持责任落实，把“七个坚持”重大原则的坚持运用纳入管党治党责任体系。“七个坚持”重大原则能否长期坚持，最终取决于有没有人负责、有没有机制问责。全会《决定》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必须扭住管党治党责任制“牛鼻子”，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责任体系。责任不落实、问责不到位，原则的坚持就容易沦为口号，选择性执行和碎片化落实就得不到纠正。把“七个坚持”重大原则的运用纳入责任体系，意味着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不仅要“知道原则”，更要对“七个坚持”重大原则在本地区本部门的执行状况负责。党委（党组）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纪委要履行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通过知责、担责、履责，实现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性认识转化为管党治党实际成效，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作者系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